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利用 操纵山东会道门述论*

梁家贵

内容提要 抗日战争期间,山东的政治、社会均出现了极为混乱的局面。为维护在山东的殖民统治,日本侵略者曾竭力利用、操纵在民间拥有相当势力、历史悠久的会道门。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给山东乃至全国的民族抗战造成了巨大的损害。

关键词 抗日战争 日本 山东会道门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为维护其在山东的殖民统治曾制定专门政策、设立专门机构,竭力利用、操纵会道门势力,山东的某些会道门也出于种种不良企图而乐于同日寇相勾结,甘愿做其“以华制华”的工具。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给山东乃至全国的民族抗战造成了极大的损害。笔者不揣浅陋,拟对日本侵略者有关政策形成的背景、主要内容及其对山东抗战造成的损害诸方面作一论述。

会道门迷信团体是封建落后社会之必然产物,最初成立大都

* 本文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重大项目资助;项目编号:2000ZDXM770009。

是由于群众忍受不了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的压迫,而组织起来的一种朴素的反抗组织。但随着在民间声势的日益浩大,这种群众组织已直接影响乃至动摇了原有的民间统治力量的地位。官僚、军阀、地主、豪绅遂改变对其的态度、策略,并逐渐将影响渗入其中,直至最终将其纳入自己的施控范围。会道门的落后、消极性益发突出地暴露出来。自近代以来,中国的会道门和土匪的活动一直是密切相联的。到了民国时期,它们的关系更加密切,已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错综复杂,难解难分的局面,对中国政治、社会产生着日益重大的影响。

山东为人口大省,封建势力素来极为雄厚。近代以来,山东多次遭到外敌入侵,此后又长期处于封建军阀统治之下,再加上频繁的自然灾害,社会尤其是民间社会时常处于无序状态下,人们的正常生活时常遭到冲击,命运极为悲惨。这便给会道门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因此,山东的会道门种类很多,分布极为普遍,计有150余种,据已知道的会道门就有:新民会(不同于抗战时期的汉奸新民会)、复兴会、保皇党、圣人道、斥堠队、黄天道、五道会、九宫道、万字会、先天道、黑旗会、红旗会、黄旗会、蓝旗会、白旗会、青旗会、皇天教、一贯道、八卦教、战坛会、道德会、红枪会、秆子会、铁板会、无极道、九宫会、同心会、快道万仙会、万国道德会、猴子会、大刀会、金钟罩、大地坛、小地坛、皈一道、黄中会、小刀子会、孙膑大师会、眼光会、清真会(成员中以妇女占多数)、西乾会、金丹会、青年会、老年会、金钱会、中央道、圣贤道(又名一柱香、无形无像道)、秘密教、堂天道、罡风道、硬拳道等五十几种。此外,山东境内还

参见蔡少卿主编《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11页。
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10),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4页。

有一些合法或半合法的宗教团体,如孔教、道教、理教、佛教、回教、耶稣教、天主教等。山东会道门的势力也极为强大:有的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如一贯道;有的在华北地区产生影响,如八卦教、皈一道、九宫道、圣贤道以及以红枪会为中心的各种枪会。应该说,同全国其他省区一样,山东的会道门势力主要集中在农村,但有些会道门在城市中也有着巨大影响,如九宫道、中央道、一贯道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大举南侵,华北一些省区迅速沦陷。山东地处华北东翼(当时山东在地理与行政区划上属于华北区),为沟通中国南北交通的重要省区,加上拥有丰富的口、物产资源,因此,在日军整个侵华战争计划中,夺取山东是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1937年10月初,日本侵华军华北方面军在山东德县附近集结,并占领恩县、平原,遂将战火引入山东境内,至1938年5月下旬徐州会战结束时,山东完全沦为日军后方。国民党军队的迅速后撤致使山东一些地区陷入无政府状态,千百万百姓彷徨无主,广大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些会门、道门等封建迷信团体,依仗其在民间巨大的影响,迅速地活跃起来。随之,众多的杂色武装应运而生。据统计,河南、山东、安徽等省的民间武装至1938年已达100万之多。这各色各样的民间武装多属土匪或会道门武装,按其对本、中共、国民党的态度可大致分为以下三类:

一类是属于不堪忍受日本侵略军及其他土匪武装的蹂躏而在原有的会道门基础上进一步吸收群众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日军侵入山东后,烧、杀、奸、掠,无恶不作,制造了多起惨案。一些土匪也趁火打劫,国民党的散兵游勇也以抗日为幌子,向老百姓要钱、要粮、要枪,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敲诈勒索,社会秩序非常混乱。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62页。

于是,广大群众借助原有的会道门势力联络起来,组成武装,例如济南、泰安相继沦陷后,散布在泰山各地的会道门纷纷设坛收徒,发展组织,会门名称有 10 余个,人数多达数万人,其中以莱芜的硬拳道、泰安的无极道、博山的堂天道、果风道等最有影响。这类武装多以保家保产为号召,以各种形式打击日军,并同国民党、共产党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

一类是被地主、豪绅组织、操纵的联庄会、会道门武装。联庄会本来是一种以一个大村或邻近几个村庄联合组成的、带有浓厚封建迷信色彩的群众防匪防乱的保家自卫组织,有的还和会道门合为一体,领导权一般都掌握在地主及上层人物手里。抗战爆发后,地主、豪绅纷纷组织联庄会,有的扩大力量,建立脱产武装。这类武装中,一部分在中共的争取、改造下坚决走上了抗日的道路,如巨北的联庄会、莒县、诸城的普济佛教会、郓城的秆子会等,但有相当一部分因经济、政治企图而“变坏通敌,成为汉奸,同我们作对,破坏抗日”。1938 年,山东莱芜中央道道首张无海自称“铜头铁罗汉”转世,纠集徒众万余人投降日军,被编为第九旅,即是典型的事例;其他如聊城的忠孝团、德州的黄沙会、菏泽的红枪会、五莲地区的万仙会等也纷纷投靠日军。他们多与国民党交好,而以“联合有神论、打倒无神论”的借口极端仇视共产党。

最后一类是抱有各种不良企图的人假借抗日名义组织起来的武装。日军占领山东后,国民党县乡政权宣告垮台。在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还没到达,日、伪势力尚未深入到广大农村之际,土匪、

《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 24 辑,第 23—43 页。

《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 24 辑,第 11 页。

《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 24 辑,第 11—44 页。

路遥:《山东民间秘密教门》,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30—534 页。

兵痞、青洪帮和会道门头子趁机蜂起,招兵买马拉起“义勇军”。一时,团长、司令多如牛毛。他们常常打着抗日的旗号,干着蹂躏、残害人民,干扰、破坏抗日的罪恶勾当,到处横行霸道。穷苦百姓过着“白天怕见人跑,夜间怕听狗咬”的日子,提心吊胆,不得安宁。这类武装大多最初游离在日本、国民党、共产党之间,继而投靠日军,如长清县的红枪会头子朱存祯(绰号为“朱小辫”),他先与国民党、共产党表示亲近,1940年5月又投靠日伪势力,并在日伪支持下成立了“长肥平红枪会总团部”,自任团长;1939年底,鲁西南红枪会头子安天国以湾杨村作为据点,设立红枪会总部,公开投降日军,并叫嚣“杀尽6县的共产党”;莱芜硬拳道首领元象德拥有教徒1万多人,最初经中共地下党员的统战工作,积极抗日,但自1939年起同中共武装开始发生摩擦,至1940年公开投敌。

上述事实说明,抗战爆发后山东出现的以会道门为主体的杂色武装对待日军、中共、国民党的态度是各种各样的,其中既有亲日的,也有经过中共说服而亲共的,但就整体而言,会道门的自身特征决定了它们的自卫意识极为强烈,成员“虽有善恶之分,但均以宗教信仰为基础”,对日军、中共、国民党一般不会主动采取敌对行为,也不会进行积极协作。

二

抗战全面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在对中国发动军事进攻的同时,

《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24页。

张保英:《平息湾杨红枪会暴动》,《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2),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23—424页。

《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第38—43页。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7页。

积极寻找汉奸,扶持傀儡政权,企图实现“以华制华”的政策。在侵占山东各主要城镇后,日本侵略者即提出了“以鲁人办鲁事”的骗人口号,到处招收土匪,搜罗恶霸大地主和退職大官僚及有枪杆的土著团阀,组织成立治安维持会,选由汉奸充任会长,以实现“以鲁制鲁”。面对山东混乱的政治、社会局面,日本侵略者也充分认识到会道门势力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经过对山东占领区大肆烧杀抢劫征服效果不显著后,更加“重视征服民心……提倡会门佛道”。事实上,早在抗战全面爆发前,日本就对中国的会道门势力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明治维新后,随着国力的增强,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急剧膨胀,并迫切希望通过对邻近国家的渗透来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当时,日本海军、陆军派遣大量的人员潜入中国沿海及内地搜集各种情报,其中,便特别注意到了中国社会存在的会道门势力。他们通过调查,对中国的社会力量进行了分析,指出,犹如乌合之众的会道门力量将来能成为变革中国的重要实力部队。为此,抗战全面爆发后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日本特务(按日本广义解释,“凡军事活动以外的事情,都叫做特务”,其职权一方面作为兵团的政务幕僚参加政策的规划和制定等工作,另一方面作为政务执行机关担当着极其复杂的多种工作)机关专设有会道门工作部——梅花公馆,负责策动会门帮派工作,有目的、有计划地培植、利用汉奸会道门为其侵华反共服务。综观整个抗战期间,日本侵略者利用、操纵会道门主要是采用以下几种方式:

《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22 页。

[日]井木赖寿:《明治时日本对中国会党的关注》,转引自蔡少卿《中国秘密社会概观》,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98 页。

参见《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10),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05 页;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下),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6 页。

(一)创造会道门。这些会道门是一种由日本侵略者直接组织的、地地道道的汉奸组织。1937年12月24日,日本参谋部和特务机关一手炮制了汉奸组织——“新民会”。1938年7月2日,“新民会山东指导部”在济南成立。新民会在日本侵略者的卵翼之下,通过建立各种伪组织,宣传“新民主主义”,用来“矫正”中国民众的思想,使其成为“新民”,甘做“顺民”。同时,新民会还成立各种外围组织,对在民间有着相当势力、历史长久的会道门进行调查、登记,加以威胁利用,使其纷纷公开化,接受它们的管理与指导。据1941年6月统计,山东全省强化隶属于新民会的团体523个,团员137232人;1942年6月则分别增加到937个,218688人。此外,日本还在山东直接创造了一批会道门,如道德会、协和会、大同会、新生会等,据统计有数十种之多。

(二)改造原有会道门。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山东后,极力提倡复兴会道门等迷信团体,因此,一些较大的会道门迅速地活跃起来。日本会道门工作部把旧有的会道门加上政治工作(即派政工人员),使其质变名不变,达到利用、操纵的目的。1938年5月间,日本特务山口恭右自称是安清道徒,与另一大字辈的安清道徒钱宝亨相勾结,在济南宏济阿胶厂成立安清道义会筹备会,并征集同道会员登记。日本驻济特务机关给予了大力支持,不仅直接策划该会成立事宜,而且派大员出席安清道义会的成立大会,并规定,安清道义会的会员证可等同与日本颁发的良民证。经日特改造了的安清道义会的宗旨是,拥护“新中国政权”(即日伪政权),以畅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度新民会山东省联合协议会议录》,转引自刘大可等著《日本侵略山东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7页。

《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8),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0页。

《沂水文史精粹》,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页。

达民意,复兴中国,振作安清道友,建立防共阵线,彻底反共,团结安清道友与友邦提携以达反共救国之目的。至1943年,安清道义会以济南为中心,分布在济南、东临、曹州、泰安、青州、兖济各道和沂州道、武定道等地,共68个分区,42917人(仅指登记人数)。其他经日特改造的会道门还有一贯道、秘密教、提篮子会、硬拳道、黄沙会等。另外,日本侵略者曾下了极大的力量,以“万道归一”的口号企图统一山东会道门,如将红卍会、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一贯道等会道门组织成为“山东宗教联合会”;1942年,京师普济佛教会为适应东亚和平的需要,在日军的授意下改名为“未来和平宗教会”,不久在济南组织分会并建立“山东保卫团”,协助日军进攻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

(三)利用会道门。这不同于前面所提到的创造及改造等方式,而是相互利用,即日本给予会道门以充分发展的空间,会道门则借助日本势力发展自己并为日本服务。整个抗战期间,日本侵略军鉴于时间、人力、财力等原因,对山东会道门更多地采用利用的方式。这类会道门都是利用群众迷信落后的心理,耍弄封建迷信的鬼把戏,造谣生事,欺骗、愚弄、恐吓群众,大肆摧残妇女、骗取群众钱财。同时,该类会道门还竭力依傍反动势力,借以发展、壮大自己。一贯道是该类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会道门。日军侵占山东后,一贯道不顾民族气节,乘机开展道务,广招“道亲”(即道徒),宣传什么“求神靠天”、“脱劫避难”,大量印制所谓“明明上帝无量清虚三界十方万灵真宰”的牌位,挨家挨户,强行供奉。日军侵占到那里,一贯道的组织便发展到那里。正因为如此,一贯道在抗战

段子涵:《安清帮在济南的活动概况》,《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206—210页。

《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10),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7页。

转引自邵雍:《中国会道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30—331页。

期间发展成为最庞大、最有势力的会道门组织。据估计,仅济南一地道众就曾达 10 多万人。九宫道是该类中另一重要会道门。早在抗战爆发前的 1926 年,济南九宫道头子于效坤、张殿卿便投靠日本驻济特务机关。1928 年“五三惨案”发生后,该会门因对日特报效有功,日特驻济机关曾赐匾一个以示奖赏。日军占领山东后,九宫道头子李书田寻求到日本支持,在济南成立了“未来和平宗教会”,积极扩大势力。其他的还如铁板道、皈一道、部分天主教,据统计有二十多种。这类会道门在抗战期间积极投靠日本,成为了日寇统治山东的忠实走狗;抗战胜利后,又依附国民党政府;新中国建立后,被人民政府依法取缔。

日本侵略者对于违背自己意旨的会道门,均坚决采取取缔、查封的策略,如博山“堂天道”接受八路军的抗日政策后,立即遭到了日寇的“扫荡”;夏津县境内的耶稣教便被“驻屯皇军警备队于民国 30 年查封”。在日特的精心策划、安排下,据统计,至 1943 年 8 月,山东的 70 余种会道门仅有 10 多种未被日特利用、操纵,其中,仅回教、耶稣教、天主教、红枪会、青帮(安清道义会)的登记人数就达到 560630 人,分会(或分区)达 2826 个,而在新民会领导下的民众团体可以动员 193.1 万人。并且,在未被日特利用、操纵的 10 多种会道门中,除极少数保持中立外,大多数也遭取缔、查封,或被迫停止活动。

徐志刚:《济南一贯道的罪恶活动及取缔概况》,《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 32 辑,第 280 页。

路遥:《山东民间秘密教门》,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18—320 页。

《山东抗日自卫团博山第一团的诞生》,《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 6 辑,第 86—88 页。

《山东省东临道夏津县境内宗教团体及信仰人数报告表》,聊城档案馆藏,卷宗号:0—10—18。

《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8),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80 页。

抗战期间,日本侵略者利用、操纵会道门,主要从事下面工作:

(一)在沦陷区,以会道门形式组织群众,配合所推行的“治安强化”运动。“治安强化”运动是日本侵略者为巩固占领区域并对抗日根据地形成新的“围剿”,而在原来“治安肃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目标是:1. 培养和加强区、乡、村的自治自卫力量;2. 加强扩大民众组织;3. 剿灭扰乱治安分子。很显然,能否利用、操纵在民间拥有巨大势力、影响的会道门,成为日军实现上述目标一个异常关键的工作。对此,日本侵略者极为重视。日军华北一一师团在1940年9月13日下达的“确立保甲制度计划”中明确提出,中国的会道门在民间拥有根深蒂固的潜在势力,虽不参与政治事务,但对于维护社会安宁极为关心,因而对他们采取怀柔态度,并了解它们的等级辈分,很好地按其身份给以尊敬,即可对之进行利用。他们假借“报家防匪”、“联合有神论、打倒无神论”的口号相号召,以会道门的形式将群众组织起来,搜捕抗日爱国人士和青年学生,巩固占领区,阻止八路军深入占领区活动,如在“治安区模范县”山东峰县,日军强迫当地农民参加红枪会组织,每天晚上都要开讲、练功夫,即使农忙季节也不例外,有时还胁迫他们去峰南抢粮。

(二)在边缘区,收买、扶持会道门,利用它们对抗抗日军民,并配合日军对抗抗日根据地进行破坏活动。边缘区是日军和中国抗日军队都激烈争夺的区域。为拓展占领区,日本侵略者对边缘区采取以“蚕食”为主,辅以加强特务活动,恐怖与怀柔兼施,强迫群众接受伪化的策略。因此,日本侵略者积极发展会道门,对抗抗日武装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73页。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7页。

《大众日报》1942年8月28日。

进行侦探,并作为向抗日根据地封锁或蚕食的先锋队。例如,新民会博平县总会便编有标有“极秘”字样的《博平县境内中共军状况调查》,对共产党的活动状况、组织,八路军的装备、给养、布防等等均有详细说明;日军曾将过去分散的鲁西南“红枪会”纠集起来,组成一支武装,疯狂地摧残抗日力量,并进攻抗日根据地。

(三)在抗日根据地,则利用会道门对抗日根据地直接进行破坏活动。日军在对抗日根据地实行极端野蛮残忍的军事“扫荡”的同时,还专设道会教育所,积极收买、训练会道门分子,令其打入抗日根据地,以作日本特务活动线网之掩护,并利用一般群众的迷信、落后思想去进行组织与宣传破坏活动,如散布谣言、暗杀投毒、扰乱、刺探等。此外,这些会道门分子还利用中共政策上的弱点(如负担重、差务多、站岗放哨多等),组织群众反抗抗日政府,在日军进行军事“扫荡”时作内应,或武装暴动,有的则长期埋伏。

三

抗战期间,日本竭力利用、操纵山东会道门,而某些会道门也乐于同日本侵略者相勾结,甘心做其“以华制华”的工具。某些会道门虽投靠国民党军队,但又与日军保持着联系,同时,积极反共。日本侵略者的有关策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某些会道门之所以如此,既受日本侵略者有关策略的影响,更是它们反动本性使然:首先,会道门自身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使其对共产党的信仰、宗旨不能认同,并进而影响到对中共抗日政策的接受,日寇正是利用这一

中华民国新民会博平县总会:《博平县境内中共军状况调查》(极秘),聊城档案馆馆藏,全宗号:32-04-13。

《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5—18页。

点,才提出了“万道归一”、“联合有神论、打倒无神论”的口号;其次,某些会道门害怕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力量的发展会冲击自己的势力,例如泰西昆山县徐楼村、耿楼村红枪会对中共抗日主张进行中伤,阻碍中共组织群众并迫害抗日人士即是一例。当然,中共有关政策也导致了会道门倒向日寇。由于中共没有掌握政权,部队的给养、各级政府部门的开支等主要是通过动员群众或向地主募集的方式,即所谓“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枪出枪、有力出力”,由此加重了中农以上尤其是地主的负担,因而引起了他们的不满,那些领导或能施加影响于民间武装,特别是会道门武装的地主豪绅甚至因此发动叛乱。1939年12月鲁西南曹县发生的红枪会暴乱即是典型的一个事例。另外,中共在执行对会道门的政策时也发生了一些失误,例如一些中共人士曾认为,会道门落后,有迷信仪式,因此称之为“会匪”,甚至提出了“取消会门”的口号,在“锄奸”工作中也处决了一些不应处决的人等等。某些会道门倒向日本,给山东乃至全国的民族抗战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主要集中在:

(一)散布谣言,惑乱人心。在日本侵略者占领山东以前,一些反动会道门极力散布亲日、投日的言论,在民间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如一贯道宣传“三期未劫,躲灾避难”,说什么,“炮声起,石桥断,南方火牛冲下山,燕京失,天津光,兵马直到黄河边。过一劫,又一劫,劫难不难,万路不通,惟一线”,并胡说日寇侵华是上天

参见王显柱、戴永显著《平息徐楼红枪会暴乱》,《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

(2),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39—442页。

陈廉:《抗日根据地发展简史》,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97页。

《山东革命历史档案选编》(8),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0页。

《抗日战争初期党对泰山区道会的统战工作》,《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第38—41页。

的安排,因此要“和为贵,忍为高,闲坐思己过,莫编人是非”;三罗大同龙华会鼓吹“水里生出太阳星”;伏羲教鼓吹“数”等等。日军“扫荡”抗日根据地时,会道门便散布恐怖言论,如日军进攻沂蒙根据地时,秘密教就编造恐日的歌谣:“春到五月桃花开(因为是五月扫荡),遍地死人无人埋,俊俏佳人身无主,绫罗缎匹无人爱”;又:“红球落地遍地坑(红球指日军之炮弹),不论穷富放悲声,八路军婆娑世界,遍地江山人该死,骨头成山血成汪。”当中共发展民众团体,扩大抗日爱国力量时,一些汉奸会门又造谣说“推背图”上写着:“单看龙蛇跨马,五洋大闹中华;西方佛子回去,胡儿对对还家。”意思是上天说五洋各国进攻中华是“天命”,是“气数”,非得等到西方的“佛子”回去以后,鬼子(胡儿)自然就出去了。既然如此,当然也不用参加什么抗日了。当中共利用反“扫荡”胜利的大好时机扩大宣传、进行扩军时,会道门又放出了谣言,说天书上写着:“牛八领兵下江东,十八子把帝封。”意思是,朱德(牛八)领兵到黄河以东打天下,但是将来朱德不能成功,是姓李的(十八子)得了天下。如此,人们当然又不必参加八路军了。

(二) 出卖、搜捕、残害共产党员及其他抗日爱国人士。某些会道门出于反动本性,并在其日本主子的指示下,极端仇视共产党员及其他抗日爱国人士,极尽出卖、搜捕、残害之能事,无数的共产党员、抗日爱国人士横遭杀害。一贯道公然要求道徒要以“忠诚”的标准,检举、告发“八路嫌疑”。硬拳道头子元象德投日后,立即

转引自陆仲伟《一贯道内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页。

《山东省东临道夏津县境内宗教团体及信仰人数报告表》,聊城档案馆藏,卷宗号:0—10—18。

《山东革命历史档案选编》(8),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0—81页。

徐志刚:《济南一贯道的罪恶活动及取缔概况》,《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281页。

取消了中共设立的盘查站,并将原来合作的中共干部及其家属出卖;老土匪、青帮头子、曾任日伪高唐县县长的李九(李彩题)不仅杀害了中共鲁北特委书记李春荣等人,还勾结其他汉奸谋害地方抗日爱国人士多人。德县黄沙会总坛长陈海泉接受日军改编,先后在河北省故城县丁庄、景县陈庄一带残害农会干部与抗日积极分子多人。湾杨红枪会最初并不反对抗日,中共鲁西南各级党组织也积极争取他们参加抗日。但自 1939 年夏河南考城小宋集一带红枪会会首安天国来到并实施离间阴谋后,红枪会便聚集会众抓、打抗日工作人员,公开打起了反共、反抗日的旗号。1939 年 12 月 23 日,安天国等带领红枪会会众分路进入安陵集,惨杀了中共安陵区委书记,并扬言要“把工作队赶出鲁西南”。此类事件,不胜枚举。

(三)制造暴乱。抗战时期,某些会道门在边缘区、抗日根据地不断煽动对中共政策不满的封建势力,利用会道门在中国农村中广泛巨大的影响与群众的迷信落后心理,同时也抓住中共初期在边缘地区政策上的失误,操纵在各地普遍存在的会道门,从而造成了群众与中共的对立,暴乱事件时有发生。全面抗战爆发后,鲁西局势极为动荡,一些土匪、兵痞、青洪帮及其他会道门残害群众,并组成“抗八(指八路军)联军”,破坏抗战。在中共的团结、争取

《抗日战争初期党对泰山区道会门的统战工作》,《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 24 辑,第 42—43 页。

程明三、周裕来:《八路军 129 师津浦支队始末》,《山东文史资料》第 32 辑,第 24—26 页。

路遥:《山东民间秘密教门》,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31—532 页。

张保英:《平息湾杨红枪会暴动》,《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2),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423—424 页。

程明三、周裕来:《八路军 129 师津浦支队始末》,《山东文史资料》第 32 辑,第 25 页。

下,国民党山东第六专区专员范筑先接受中共的抗日政策,建立了鲁西抗日根据地。鲁西寿张、阳谷、东阿的忠孝团(红枪会的一个分支),长清的黄沙会,多次发动大暴乱,并叫嚣要“打倒范筑先,驱逐共产党!”在他们的配合下,日军于1938年11月中旬攻陷聊城,范筑先以身殉国。鲁西出现的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好形势遭到了破坏。1945年1月,沂水九宫道头子李洪吉、邱锡三等密谋发动暴乱,被侦破。1945年2月初,邱锡三再次策动暴乱,鼓吹“我们大佛道马上就要明道了,我们要消灭八路军,消灭政府”。在这次暴乱中,八路军十二团驻崖下从事军垦的10余名干部战士惨遭杀害,多名进步群众丧命。这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崖下惨案”。

(四)协助日军进攻抗日根据地。反动会道门大都设有脱产的武装组织,不仅搜捕、残害共产党员及其他爱国人士,还协助日军对抗日军民展开军事、政治行动。阳谷县“忠孝团”头子赵长显(外号赵二虎)纠集会众千余人投靠日军,被任命为鲁西“剿共”大队司令,盘踞七级、阿城、张秋一带,对鲁西北抗日根据地不断进行政治破坏和军事袭扰。威海先天道提出“天兵神将刀枪不入,与共产党誓不两立”,在洪水岚的一次战斗中惨杀抗日武装11人,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忠实工具。诸城九宫道按九宫、八卦形式建立武装,配合日军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1943年8月,袭击越庄的区公所,洗劫太古庄、泊罗林子、楼子等村;1944年又制造了刘家庄、小岳古庄两次大惨案。1944年秋,诸城九宫道青极盘盘主高振亮在白龙山设佛堂,组织“灵山部队”,猖狂叫嚣什么“共产党是扫世

姜克夫:《范筑先》,《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国人物传》第3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0页。

《九宫道在沂水县发展、演变及反革命活动情况》,《沂水文史精粹》,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202页。

《鲁西北革命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174—176页。

的,做皇帝还是高振亮的”反动口号,在1945年1至6月间,配合日军对抗日游击区进行了7次“扫荡”。此外,某些反动会道门分子还打入抗日根据地,实施暗杀投毒、刺探情报、离间等手段,积极配合日军的军事行动。

应该指出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尽管有某些会道门乐于同日本侵略者相勾结,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会道门及其成员最终走上了抗战的道路。这主要是因为:第一,抗日战争本身是一场保卫家乡、挽救民族危亡的自卫战争,任何一个稍有国家民族观念的中国人都不愿做汉奸。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浪潮也极大地冲击了会道门的旧体制、旧观念。他们在“抗日高于一切”、“保卫家乡”的口号下,创造了许多奇迹。

第二,共产党、国民党都相应采取了争取、改造会道门的对策。中共山东党组织对会道门的对策是:(一)在根据地,明令禁止,向人民宣传、解释敌人利用封建组织破坏根据地的阴谋,并指出某些证据。对某些会门头子与日寇勾结有破坏行为的,号召会门群众起来反对。会门头子必须向抗日政府自首、具结,宣誓不再进行会门活动。对广大会门群众,则予以深入教育并吸收加入各抗日群众团体。(二)对日军占领区或边缘区之会门,则派人积极打入,争取与团结会门群众,孤立其中汉奸分子,推动会门打击敌伪下乡抢掠的便衣队、特务分子,拖延、减轻对敌负担,广泛揭露敌人残暴,反对抽壮丁,利用矛盾打击汉奸。1942年1月,中共山东党组织明令取缔会道门组织,1943年3月,中共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颁布

路遥:《山东民间秘密教门》,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331—334页。

参见蔡少卿:《中国秘密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7—353页。

《山东革命历史档案选编》(10),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6—137页。

转引自《广饶县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80—82页。

法令,禁止会道门活动。国民党为维护统治区社会秩序的稳定、防止会道门被日伪势力利用,曾于1939年11月由国民政府内政部出面查禁会道门。但由于国民党与会道门有着密切的联系,加上对会道门迷信团体之组织、团结群众的作用也非常重视,因此对会道门的查禁仅是做表面文章(事实上,国民党的会道门政策前后是有变化的)。同时,国民党山东党部时常利用会道门破坏中共领导的根据地,甚至组织暴动。不过也应承认,国民党在防止会道门被日伪利用方面,也做了一些有成效的工作。

第三,日军对中国民众的粗暴行为、经济负担过重等原因也使广大会道门对日本侵略者产生怨恨。另外,一些会道门逐渐认识到投靠日本侵略者没有出路,也导致它们最终放弃了对日本侵略者的依赖。

伴随着中国民族抗战形势的逐渐明朗,越来越多的会道门投入到抗战中。直至抗日战争胜利,日本侵略者利用、操纵山东会道门的阴谋才宣告破产。

(作者梁家贵,1968年生,山东聊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李仲明)

《解放日报》1943年7月27日。

《新华日报》1939年11月27日。

参见周育民、邵雍《中国帮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66—678页。

《山东革命历史档案选编》(10),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6页。